

B946.5
89

曹溪禅学与诗学

张海沙 著

暨南国学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曹溪禅学与诗学

张海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溪禅学与诗学 / 张海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暨南国学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7950 - 5

I. 曹… II. 张… III. ①禅宗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B946.5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746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暨南国学丛书序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初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其诞生是出于华侨教育的迫切需要。

我国古代不乏在文化和经贸上的对外交流，汉、唐、宋三朝尤甚。相比之下，明代虽有郑和下西洋，清康熙帝也对外来文化怀有很大的兴趣，但总的来说，这两朝多处于海禁时期。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海禁大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美洲的开拓，我国东南沿海的穷苦人民也因迫于生计而出国谋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少政治流亡者流落到了东南亚，使得南洋群岛的华人大增。在世界风潮和国内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海外侨胞的近代教育也为之兴起。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私塾义学的办学模式，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但由于地处南洋的此类学堂多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华侨中普遍出现了回国升学的愿望。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视察华侨教育，1906年，清政府学部再度派人到南洋调查学务，年底，电咨两江总督端方关于在南京办理爪哇侨生归国读书事，得到了端方的肯定。端方向朝廷上奏折，提出了南洋各岛和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折，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遂于南京开始筹办。1907年3月，国内第一所华侨学校在南京鼓楼薛家巷诞生，因学生多来自南洋，故取《尚书·禹贡》中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名之为“暨南学堂”。

暨南学堂在辛亥革命中停办，1918年又在南京薛家巷复校，分设师范、商业、补习诸科和小学。因侨校所负“声教南暨”的使命，遂据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立下了“忠信笃敬”的校训。在经过了商科迁沪及与东南大学合设上海商科大学之后，暨南迁校至上海近郊的真如，使得在此地的1923年到1937年，成为暨南校史上的辉煌时期。1927年郑洪年被任命为校长，提出了三部六院的华侨最高学府发展目标，暨南学校得以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经历过南京创建、真如发展、迁址孤岛和福建建阳以及战后回沪等时期，在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在校侨生甚少，加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遂于1949年9月合并入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陶铸同志兼任校长。经近10年的努力，暨大已发展成一所粗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重灾区，被迫于1970年撤销，校址被占，各系科分别并入其他各校。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进行重点扶植，自此，暨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多年来，学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重新恢复了华侨最高学府的地位。

在暨南大学迄今98年的历史中，虽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也因战争和政治的诸多原因，使“系侨情”的宗旨受到了干扰，但就总体而言，始终是本着“宏教泽”的目的而不忘“声教南暨”的。从办学之始，就是为了适应华侨眷恋乡土、挚爱祖国文化之需，而将为华侨子弟开设祖国语言、文化等课程置于首位。在1927年郑洪年校长制定的《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办学目的、方针是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曾短暂代理校长的沈鹏

飞也认为“文学院文史课程，为发扬我国故有文化之主要学问”。因此，对暨南大学这一侨校而言，传统的“国学”具有本土之学与“声教”“南暨”的特殊的、双重的意义。而在暨南大学的历史上，国学也确实曾有过很高的地位和较长时期的辉煌。

1927年秋，暨南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成立，开始招收新生，两年以后，文学院成立，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四系。文学院院长为著名学者陈钟凡，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夏丏尊，后由陈钟凡兼任，此后又由陈柱尊继任中文系主任。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叶公超，继任主任梁实秋，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黄凌霜，继任主任许德珩。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李达、邓初民、钱亦石、杨公达、洪深、夏衍、张君勱、张世禄、沈从文、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等。即使是中学部，也有任国文教师的曹聚仁、汪静之，任英文教师的周谷城、顾仲彝、许国璋等著名学者。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曾先后担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有陈钟凡、郑振铎、许杰、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有夏丏尊、陈钟凡、陈柱尊、龙沐勋、张世禄、郑振铎、许杰、刘大杰、郝曷衡等，担任历史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地理学系）主任的有黄凌霜、许德珩、张凤、周谷城、周予同、丁山等知名学者。1928年陈钟凡任中文系主任时，除自任散文、文学史教学外，还有教授陈柱教诗、古方言、专家文，刘觐教诗、《说文》、音韵，张凤教古文字学，兼任讲师陆侃如教诗史、诗论，郑振铎教小说，饶孟侃教文学概论、文法，讲师冯淑兰教词和词史，张世禄教语音学，龙沐勋、王家吉、马承钧教各体文，徐中舒教各体文和古文字学。仅此已可知当时暨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盛。

在郑振铎任文学院院长时，第一年度（1935—1936）全力整理课程，然后努力充实中文、外文、史地诸系的图书资料，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文学院还创办了三种学术刊物：《文史季刊》、《地理资料》和《中国戏剧》。校长何炳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和《近世欧洲史》等，

他亲自组织编纂《中国通史》教材，自任委员，另有郑振铎、周予同、陈高慵、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城教授编著成书，问世后，深得好评，被很多大学用作教材，一再翻印，后来还在港澳、台湾和国外流行。暨大很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学范畴，如鲁迅在1927年和1929年曾三次被邀到暨大演讲，其中第三次所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中文系在1935年10月到11月间，曾先后举行两次讨论会，第一次讨论“文学之遗产”，第二次讨论“文学之趋势”。20世纪30年代，龙沐勋在暨南大学创立读书会，每天早上领着三四十个男女学生朗诵诗词，领会声情，使学生的诗词创作一时甚盛。龙沐勋又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在1933—1936年，前后出版11期，对词学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暨南园不仅学会和刊物众多，而且很重视对文艺遗产的学习、继承，如文学学院院长陈钟凡为使了解古音韵的奥秘，在1933年请昆曲名家俞振飞到校讲学，使得昆曲也在校园中流传开来。即使暨大经历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学校遭受到不小损失，一度人员分散各地，但1936年《东方杂志》1月号刊载的黎照寰《青年努力新趋势》一文，仍将暨大与其他著名高校并提，在论述了全国教育界的形势后说：“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的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暨南大学地处战区，被夷为瓦砾场。在迁址租界后，“孤岛”时期的暨大，学术活动仍在进行。《暨大丛刊》持续编纂，十巨册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参考了一百多种图书资料，经四年编纂，于1940年出版，成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书。继《中国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又在1939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郑振铎出版了《中国版画史》。1940年，暨大创办《学林》月刊，所发表的如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吴文祺的《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潮》，都是带总结性的重要论文。即

使在南迁福建建阳的数年中，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也未中断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文学院的著名教授及所讲授的课程就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小说戏剧选，吴文祺的文字学、音韵学和修辞学，许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李笠、丁山的文字学，钱钟书的欧美名著选和文学批评，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等。

在暨南大学复校广州后，文史两系分别由文艺理论家萧殷和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任系主任。即使来自“左”的思潮干扰不断，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如中文系在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就很有成绩，历史系则完成了《番禺史志》的修改定稿。黄铁球教授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越南汉诗的卓越成就》的重要论文，张天翼、陈残云、秦牧等著名作家都曾到暨大作报告或讲课。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的确立，再加以暨大作为侨校已变更了早先的办学宗旨，传统意义的“国学”研究，在暨大 1958—1966 年的八年历史中，是难以讳言的中衰时期。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后，暨南大学在 1978 年复办并招生，著名作家秦牧和文艺学家饶芃子教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在 80 年代曾任文学院院长。新时期以来，暨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虽无在上海真如时期那样的诸多大家，但也出现了一批名师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老一辈学者汤肇民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老诗人陈芦荻的刘禹锡研究，艾治平教授和郑孟彤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李文初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及陶渊明研究，洪柏昭教授的元曲和唐宋文学研究，王景霓教授的杜牧研究，都有较大影响，其中艾治平教授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郑孟彤教授的《唐宋诗词赏析》都在 20 年前获得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至今，八十高龄的艾治平教授仍著书不辍，其中涉及古代诗词的著作就有 10 种之多，堪称成果累累，其他的老师也多是退而不休，仍在持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

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暨南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向，承担起培

养海外高层人才的特殊任务，并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在办学水平全面提高，科研能力节节上升的同时，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学科成员不仅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且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现在暨大从事古代文学和文献教学与科研的十多名主要成员中，只有两人是硕士，其余都是文学博士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近90%的成员年龄在50岁以下，充满了朝气和锐气。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自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经两代人的努力，20年后终于有所突破，在去年获得批准，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建起古代文学博士点和古代文献硕士点，并在今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标志着学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的暨大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韵文学，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也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和影响的成果。其中韵文学方向以词学研究为主，艾治平教授的《婉约词派的流变》、《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魏中林的《词综注》，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和我本人的《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等，多具有原创性。诗学研究有李文初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山水文化》，李文初以诗歌为主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和魏中林的《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徐国荣的《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也是颇具首创性的著作。在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上，蒋述卓从事研究较早，其完成于80年代的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被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出版，还有《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化的关照下》、《宗教艺术论》等著作，此外，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复古与复元古》，张海沙的《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分别论述了庄学、儒学与禅宗对古代美学和文学的影响，史小军的《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也属于该方向的著作。古

代叙事文学有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和《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等。古代文学史科学有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等，以及集体编著的《宋代文学理论集成》、《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军事散文精选》、《中国历代小品选》、《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等。在以上四个方向以外，我本人又有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中国绘画思想史》、《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和《学者闻一多》（合著）等。

由于近年来对科研的提倡和重视，在高校“211工程”建设中，从教育部、广东省，直到学校，都对学科建设、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投入、支持，更促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新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产生。为此，我们据本学科点成员近年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研究课题，编辑了这套丛书，共计12种，名之为《暨南国学丛书》，计有：徐国荣的《玄学和诗学》，张海沙的《曹溪禅学与诗学》，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史小军的《明代七子派研究》，王进驹的《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全秋菊的《古代荒诞剧研究》，陆勇强的《陈维崧年谱》，魏中林的《近代爱国诗潮研究》，赵维江的《古代词的形式嬗变》，程国赋的《三言二拍传播研究》，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以及我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其中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多年打磨后终与读者见面，或为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古委会、教育部、广东省、省高教厅立项的科研项目。从书名可见，它们仍在四个研究方向之内，而就个人而言，则标志着自己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和合理发展，对集体来说，则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研究成果，在多具原创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因各人立题和写作的时间不同，篇幅大小有异，自然完成也有先后，丛书打算在两年多内陆续出版。可以相信，在这12种著作出齐后，暨大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也将达到新的水平。

我们这群人，经历不同，长幼有别，来到暨南大学的时间先后

有异，治学的兴趣和方向更是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今日都在暨南园内，所作以集体的面目出现，并以“暨南”来命名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其义又非止于此，以“暨南”为名，既起“名片”作用，又意在继承和发扬暨南大学近百年的优良传统，不忘我们今日作为暨南人所应继续的“声教訖于四海”之历史责任。虽古代文学与文献仅是国学研究中的一类，难以尽赅传统国学的全部，但无疑又是国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辨析命名同时，我们相信在属于我们近邻的史学和其他学科研究上，暨南大学也定会出现许多新成果，如果这样，我们很愿意为展示暨南国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而先走一步。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论是暨南，还是国学，也同样担负着虽“旧邦”而“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既然跨越了世纪，当然也要努力造就和见证未来历史崭新的一页，在以本丛书来续写暨大国学研究的历史，迎接暨大百年校庆的同时，我们也将满怀豪情，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邓乔彬

2004年9月26日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临风轩

前 言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① 曹溪，在韶州曲江县东南三十五里，其源出于曲江县牛岭，西流五十里合江水南下，曾有曹姓土人舍宅为寺于溪边，故称曹溪。自岭南慧能驻锡曹溪传法之后，人们将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称为“曹溪禅”，南宗禅的祖师慧能也被称为曹溪大师。发源于曹溪的南宗禅最后流布天下，其影响溢出宗教界而波及其他领域。苏轼的诗歌形象地写出了这种态势。

选择《曹溪一滴水——岭南禅学与诗学》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基于如下思考。

其一，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所谓最具中国特色，便是最彻底的中国本土化。作为一个传统深远、领土广袤、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对一种外来文化的接受与消化，换一个角度而言，既是一种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就将会更具体地以某一区域、或某一学派的思想文化习俗为依据。异质文化的融合，总是会先找到一个相融点，然后从这一点弥散开来。岭南实际上成了佛教中国化最彻底的禅宗兴起的一个文化基点。

禅学禅法随佛教的传入进入了中土。东汉末年，安世高翻译了专讲禅法的佛典《安般守意经》和大小《十二门经》，成为禅学的开创者。弘扬安世高所开创的小乘禅法的有：汉末三国时期的陈

^① 苏轼：《赠龙光长老》，《苏东坡全集》后集第七卷，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35页。

慧、康僧会，西晋、东晋时期的竺法护、支愍度、谢敷、道安等。比安世高稍晚一点进入内地的支娄迦谶，译介了大乘禅法。鸠摩罗什于公元401年来到长安所译介的禅经有：《禅经》（《坐禅三昧经》）。随着禅学的传入，涌现出了专以弘扬禅学为宗旨的僧侣，被称为禅师或禅僧。梁慧皎撰《高僧传》，有《习禅》专篇，为二十一位禅师立传。这些禅僧既有北方僧人亦有南方僧人。尽管禅僧很早就为禅学争取独立地位，但是，直到唐代岭南韶州慧能的出现，以后南宗禅统一南北禅系，南宗禅才使得禅宗在佛教中独立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派。南宗禅的树立，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禅宗甚至佛教本身。它对宗教、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使得禅宗智慧之花生成且绚丽呢？《坛经》里记载了二祖惠可一颂：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当本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若将禅之智慧喻为花，则应生长盛开在适合它的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上。岭南是禅宗发展兴盛的重镇，禅宗在岭南于唐代酝酿成熟后，向全国展开，“凡天下言禅言，皆本曹溪”^①，岭南在禅之历史上的重要性已被注意。《曹溪禅人物志》^②所收入的四百位禅僧中，广东籍禅僧占七十二人（其中韶关籍禅僧三十二人），其中有新兴慧能（638—713）、高要希迁（700—790）、南雄慧寂（814—890），成为禅门宗派的开山祖师。大多数（三分之二）的广东籍禅僧到省外甚至海外弘法，他们将带有岭南文化特征的禅学与禅法播撒到四方。岭南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对禅宗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岭南禅文化兴盛的现象及其内在的特征和历史影响，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本书愿对此作出初步研究。

① 刘禹锡：《赐大鉴禅师碑并序》，见《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易广行：《曹溪禅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其二，南宗禅对禅学的革命不仅在宗教界意义深远，而且对思想界、文学创作界、诗学领域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唐代宗教革新运动展开之时，正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求新求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禅学，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将它称作“禅的开展时期”，而在诗学史上，是中古到近古的转折点。

诗学的革新与革命需思想武器的装备。中唐散文文体革新以复兴儒学为号召，散文文体的绝大部分是实用性、应用性很强的文体，在以儒学立国的封建王国，散文的写作以儒学为表里是可以理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领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在三教并举的唐代，文人往往会兼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倡导儒家思想的人，他的诗文创作也可能会表现出佛教或道教的倾向。至于诗歌理论，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晚唐时期，有大量诗歌理论著作的作者其身份是佛教的背景。

张伯伟先生的《唐五代诗格丛考》^①，对唐五代十五种诗话著作进行了考辨，在已题作者名的十一种诗话中，有贾岛（僧名无本）的《二南密旨》、释齐己《风骚旨格》、僧神髓《诗格》、僧景淳《诗评》，可见僧人是诗话创作队伍的生力军。另外，佚名的《诗格》遗文一篇只保存在敦煌残卷中，亦有许多诗话材料依赖于日本僧人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保存。可见僧人对诗歌创作、诗学理论的关注，可证明僧人大量地参与了诗歌理论的建设。

中晚唐诗歌理论建设最得力者是僧人。中晚唐的佛教界理论最活跃的是禅学，特别是南宗禅思想。实际上，南宗禅在宗教界引发革命的同时，也给诗学理论的革新提供了思想武器。从审美观念、审美范畴、诗学体系到诗歌表现方法，佛教禅学都给诗学和诗歌创作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气。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揭示中唐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创新的思想渊源。

岭南独特的历史地理特征和人文文化传统是本书研究的基点，

^① 张伯伟：《唐五代诗格丛考》，《文献》1994年第3期。

因此，本书第一章便是这个内容。禅门两位领袖人物菩提达摩与慧能都与岭南关系密切，本书对二者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诞生于岭南的禅宗六祖慧能，笔者力图找到岭南的精神与慧能宗教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南宗禅思想的形成受到几部重要的佛教经典的影响，根据《坛经》的记载，主要有《金刚经》、《维摩诘经》及《法华经》等，本书着重讨论了上述三部佛教经典的传播及对南宗禅的影响。佛教经典中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成而被称为经典的《坛经》，在其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之后，不仅对宗教界也对诗学和诗歌创作、对文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对此进行讨论。以岭南及岭南的禅学影响为背景，我们对岭南的贬谪诗人及生长于岭南的唐代名臣张九龄的诗歌特征及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在试图揭示南宗禅的几个主要派别的思维特征及其诗学影响之后，是对宋代极具影响力的而且是以禅喻诗的代表性诗话著作《沧浪诗话》的讨论。

从时间的流变而言，本书是以唐宋两代禅学与诗学发生剧变的时代为背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流派作为研究基点，作者努力想做到在理论切入的深度和分析面涵盖的广度上达到一个使自己满意的程度。但是，“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①。以岭南地域特征为背景的禅学研究，必须对岭南地理文化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也必须对禅学的发展流变史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就已经深感自己相关积累的不够。从这个意义而言，真是有待将来了。

① 《文心雕龙·神思》二十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岭南地理沿革及禅文化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岭南地理沿革及南越族特征	(1)
第二节 海上通商及海路佛教东传	(16)
第二章 达摩西来的禅文化意义	(23)
第一节 对达摩西来意旨追问的禅文化意义	(25)
第二节 达摩西来之意问答之间表现的禅风特色及 诗意表达	(33)
第三章 禅的传播及慧能作为禅宗六祖地位的树立	(43)
第一节 禅的早期传播	(43)
第二节 慧能作为禅宗六祖地位的树立	(52)
第三节 慧能以后南宗禅的传播	(63)
第四章 影响南宗禅思想的佛教经典	(74)
第一节 《坛经》中的《金刚经》与《维摩诘经》	(74)
第二节 《金刚经》在唐宋时期的传播及被接受	(78)
第三节 唐宋文人的“维摩情结”	(94)
第四节 《妙法莲华经》与南宗禅“转法华”的方法	(126)
第五章 宗教革命与诗学观念的革新 ——《坛经》的诗美学意义	(162)
第一节 标举自性、推崇顿悟与重心性、重独创的诗 美学倾向	(162)
第二节 直指人心、废除文字与诗学中“但见性情，	

不睹文字”	(166)
第三节 不拘坐禅形式、随顺通流，与诗学中自然任诞的追求	(172)
第六章 岭南贬谪诗人对禅学的接受及诗歌表现	(178)
第一节 宋之问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诗风的转变	(179)
第二节 张说的禅学思想及其诗歌	(189)
第三节 苏轼在岭南及与南宗禅的关系	(201)
第七章 唐宋文人对慧能和《坛经》的接受	(222)
第一节 唐代文人对慧能和《坛经》的接受	(222)
第二节 宋代文人对慧能和《坛经》的接受	(232)
第八章 岭南名相张九龄的岭南精神与佛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246)
第一节 岭南名相张九龄的岭南精神	(248)
第二节 张九龄的佛学思想	(267)
第三节 张九龄的诗歌创作	(272)
第九章 南宗禅主要宗派禅法思想及诗学影响	(280)
第一节 临济宗创造性思维特征	(280)
第二节 云门宗宗风与晚唐五代诗论及诗风	(288)
第十章 南宗禅对宋诗话著作《沧浪诗话》的影响	(303)
第一节 “妙悟”——艺术主体掌握的独特认识方式	(303)
第二节 不落言筌——创作主体的表达方式	(321)
后 记	(337)